心理科学进展 2018, Vol. 26, No. 5, 939–950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8.00939

集体仪式促进凝聚力：基于动作、情绪与记忆*

邹小燕 尹可丽 陆 林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昆明 650500)

摘 要 集体仪式对群体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国外心理人类学家提出的“宗教模式理论”深刻阐述了集体仪式产生群体凝聚力和亲社会行为的心理过程。集体仪式的心理学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集体仪式促进凝聚力、同步动作影响亲社会行为, 以及集体仪式导致群际偏差等方面。未来的研究需要对集体仪式促进凝聚力的心理机制进行系统地考察, 并将激发愉悦情绪的集体仪式也纳入到研究范畴中。

关键词 集体仪式; 凝聚力; 亲社会行为; 同步动作
分类号 B849: C91

仪式(ritual)是文化的传承, 人类的行为标记。集体仪式(collective ritual)不仅是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以及社会学研究最为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 还得到社会心理学、认知科学、进化人类学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者的青睐。从狩猎社会到现代化国家, 解决适应问题都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必要途径。研究者发现, 集体仪式能解决伴随社会群体建设和发展所产生的适应问题(Whitehouse & Lanman, 2014; Legare & Watson-Jones, 2015)。就解决适应问题而言, 集体仪式主要有四个功能, 即识别群体成员、保证群体成员对群体的承诺、促进与联盟的合作、维持群体凝聚力(Legare & Watson-Jones, 2015; Shaver & Sosis, 2014; Watson-Jones & Legare, 2016)。除此之外, 集体仪式还能维持社会秩序、减少群体冲突(Jones, 2013), 从而促进群体建设(Rossano, 2012; Uche & Atkins, 2015)。

近年来, 国外人类学家提出了一些涉及行为、认知、情绪等心理元素的集体仪式理论, 而“宗教模式理论”是其中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心理学家对集体仪式的核心要素之一——同步动作开展了诸多研究, 并且一些研究着力考察集体仪式如何对凝聚力、亲社会行为以及群际偏差产生影响, 开拓了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收稿日期: 2017-10-11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31260240)。
通信作者: 尹可丽, E-mail: yayasles@163.com

1 集体仪式的心理要素

对仪式的界定是多样的。动物行为学家主张用刻板、重复这样的标准来定义仪式(Payne, 1998), 然而动物的仪式实质上只是仪式化行为(ritualized behavior), 只有人类才有仪式。人类的仪式化行为通常镶嵌在更大的仪式中, 仪式不仅包括仪式化行为的特征, 还具有其他重要特征, 如神圣性、象征性、传统性和表演性(Bell, 1997; Rossano, 2012)。人类学家认为仪式是模式化、有序的语言和行为序列, 以常规、刻板、融合和重复为特征, 当这些行为与超自然的话题相关时, 则为宗教仪式(Tambiah, 1979; Rappaport, 1999)。可见, 人类的仪式化行为十分复杂, 是释放性的(emancipated)、程式化的、重复的、引人注目的、规则化管理的活动(Rossano, 2012)。有研究者认为根据参与人数的多寡, 可以将仪式分为群体仪式和个体仪式(Neale, Mizerski, & Lee, 2008), 也有研究者直接将仪式看成是社会规定的群体惯例(Legare & Herrmann, 2013; Whitehouse & Mcquinn, 2013), 即集体仪式。

Whitehouse 和 Lanman (2014)指出, 集体仪式是一个包含着诸如同步动作(synchronic movement)、因果关系不透明的动作(causally opaque action)、愉悦和焦虑唤醒等现象(euphoric and dysphoric arousal)的民间范畴, 这个范畴涉及许多认知和行为的普遍模式。它由预先确定的躯体动作序列组成, 是社会激发的、有着归属功能的常规行为的

一个子集，以形式化、重复、冗余、固化形式和因果关系不透明(causal opacity)为特征(Kapitány & Nielsen, 2015; Legare & Herrmann, 2013)。就集体仪式的核心要素而言，当前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同步动作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认为同步动作才是仪式和集体展演(collective display)的显著特征(Fessler & Holbrook, 2016)。同步动作指以相同频率和(或)周期对周期性行为进行匹配的趋势(Clayton, Sager, & Will, 2005; Reddish, Bulbulia, & Fischer, 2014)，包括宗教性的音乐、舞蹈、吟诵、游行等(Wiltermuth & Heath, 2009)，强调群体成员之间动作的协调一致性。另一种观点则将因果关系不透明看作仪式的核心成分。因果关系不透明是指无法用物理因果关系来对仪式行为和仪式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解释。因为具体行为表现(比如同步舞蹈)和期望的结果(比如下雨)之间缺少一种直观的或可观察的因果关系，所以无法从物理因果关系的角度对仪式加以解释(Legare & Souza, 2012; Watson-Jones, Legare, Whitehouse, & Clegg, 2014)。

2 集体仪式的宗教模式理论

集体仪式激发了人类在不同规模群体中协调、动员以及合作的能力，这些能力与群体的建设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当前主要假定集体仪式对群体的影响是通过提高群体成员间凝聚力和亲社会行为来实现的。为了解释集体仪式、社会凝聚力以及亲社会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提出了诸多理论，如 Turner (1985)的“一致性理论”，Bloch (1992)的“暴力反弹理论”，Whitehouse (2002)的“宗教模式理论”以及 Sosis 和 Ruffle (2003)的“宗教的昂贵信号理论”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当属“宗教模式理论”，该理论主要阐述了不同规模群体中的凝聚力和亲社会行为如何产生及其心理机制。

2.1 两种集体仪式——意向模式与教条模式

Whitehouse (2002)最早提出宗教模式理论(the theory of “modes of religiosity”)。早期的宗教模式理论主要阐述了集体仪式的分类。Whitehouse 认为，根据因果关系不透明和焦虑情绪的不同组合形式，可将集体仪式分为两大类——意向模式(imagistic mode)和教条模式(doctrinal mode)。意象模式是因果关系不透明的常规动作与高水平焦虑唤醒的结合，以恐怖仪式为代表(rites of terror)，如美国兄弟会和姐妹会的入会仪式、印度的割礼、西班牙的渡火仪式等，这种仪式会给参与者带来心理、生理上的痛苦。教条模式则涉及频繁重复因果关系不透明的常规动作以及低水平的焦虑唤醒，以常规化仪式(routinized rituals)为代表，如宣誓和祈祷等(Jones, 2013; Whitehouse, 2002, 2004; Whitehouse & Lanman, 2014)。由于其它仪式要素的组合形式十分罕见，比如因果关系不透明动作与罕见的、低水平情绪唤醒的结合，或因果关系不透明动作与频繁的、高水平情绪唤醒的结合，因此意象和教条模式囊括了大多数的仪式形式，具有跨文化普遍性。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从人类关系区域档案(the Human Relation Area Files)中提取的，来自全球范围内 74 种文化中的 645 种宗教仪式数据的证实。研究者指出，这两种类型的集体仪式能对群体形成的普遍特征进行解释，且它们的出现与社会资源的获取方式相关(Atkinson & Whitehouse, 2011)。

宗教模式理论认为社会群体规模的变化总是伴随着集体仪式的变化。集体仪式的形式与特定的社会群体规模相适应，即意向模式对应小规模群体，教条模式对应大规模群体。研究表明，社会群体规模的发展与壮大总是伴随着集体仪式的转变。Mcquinn (2012)对反对派武装集团进行了调查，发现最初的反对派武装集团都是由邻里朋友组成，由米苏拉塔战争带来的共同恐惧经历使得这些成员变得团结和忠诚。小群体因共同战争创伤而产生的凝聚力，类似于意象模式通过唤起恐惧达到的效果。随着小群体逐渐向超级旅的转变，这些反对派武装集团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教条模式”——如召集训练、汇报以及强调纪律。

2.2 两种形式的凝聚力——身份融合与群体认同

“宗教模式理论”经过不断地修改和完善，逐渐趋于成熟，在揭示集体仪式影响凝聚力、亲社会行为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Whitehouse, 2002, 2004; Whitehouse & Lanman, 2014; Whitehouse & Mcquinn, 2013)。Whitehouse 和 Lanman 指出，要理解集体仪式对凝聚力的影响，应该借鉴当代社会心理学所区分的两种凝聚力形式——身份融合与群体认同。身份融合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群体归属感，这种感觉会模糊个体自我和社会自我之间的边界，使个体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群体行为中，

以便提高个体自我和社会自我联合的可能性、激发亲群体行为(Swann, Jetten, Gómez, Whitehouse, & Bastian, 2012)。高度融合的个体会与其他群体成员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关系纽带，这种关系纽带使得个体将其他成员看成是“一家人”，即将其他群体成员当成“心理上的亲属”。因此，个体会产生一种帮助和保护其他成员的责任感，即便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同时拥有个体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个体认同感使得个体将自己知觉为区别于他人的个体，而社会认同则使个体成为与其他成员相似的个体。社会认同是融合个体自我概念必不可少的部分，当社会认同成为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就会发生身份融合。相反，当一个个体被群体认同时，他不会产生心理亲属感，而是成为一个与其他成员有着共同群体信念、习俗和价值观的想象社区的匿名成员。被群体认同的个体不会将其他群体成员看成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而是将其看成是可替代的。Whitehouse 和 Lanman 认为，不同类型的集体仪式产生不同类型的凝聚力。意象模式的参与会使个体产生身份融合，并将对群体的威胁知觉为对自己的威胁，从而激发为小规模群体战斗和牺牲的极端利他行为(Swann, Gómez, Dovidio, Hart, & Jetten, 2010)。常规化教条模式的参与则产生群体认同，群体认同不会使个体产生心理亲属感，因此无法产生极端利他行为。群体认同只能确保个体的忠诚，从而催生大规模群体的合作(Swann, Gómez, Huici, Morales, & Hixon, 2010)。

2.3　集体仪式产生凝聚力和亲社会行为

不同类型集体仪式对不同形式的凝聚力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伴随着不同的心理过程。意象模式通过两个心理过程来产生身份融合，即：通过情境记忆建构自我概念以及通过表型匹配进行亲属识别。研究者认为身份融合的产生与共同焦虑经历息息相关(Swann, Gómez, Seyle, Morales, & Huici, 2009; Swann et al., 2012; Fredman et al., 2015)。意象模式的参与在仪式参与者之间形成了共同焦虑的经历，这些经历会存储于个体的情境记忆中。情境记忆是关于“是什么”的记忆，它与具体事件及其发生顺序紧密相关。个体通过与其他群体成员分享存储于情境记忆中的共同焦虑经历来进行亲属匹配，当个体觉察到与其他群体成员拥有共同的焦虑经历时，会产生一种心理亲属感，这种心理亲属感会使仪式参与者产生身份融合，进一步催生极端利他行为。

群体认同的产生则不需要借助“心理亲属感”，它是联盟心理的产物。教条模式以常规化仪式为代表，常规化仪式向仪式参与者传递的是社会规范(如共同的身份标识、信念、习俗和价值观)，仪式参与者通过指令将其获得的社会规范存储于语义记忆中。语义记忆与事件和事件发生顺序无关，它存储的是与社会规范有关的事实。仪式参与者通过对他人共有的身份标识、信仰、习俗以及价值观的觉察产生联盟心理，从而产生群体认同感，促进成员之间合作(Whitehouse & Lanman, 2014)。表 1 总结了宗教模式理论的重要观点。

2.4　对亲社会行为的进一步解释

宗教模式理论结合宗教的昂贵信号理论(the costly signaling theory of religion)进一步解释了因仪式而产生的亲社会行为。宗教的昂贵信号理论认为：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个体之所以想要加入群体是为了获得群体利益从而得以生存。仪式通常包括看似昂贵的行为，用可靠的、难以伪造的信号传达着群体成员对群体的忠诚，进而促进和巩固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团结(Henrich, 2009; Sosis & Bressler, 2003)。就仪式展演所需的

表 1　宗教模式理论

仪式类型	特征	存在形式	心理机制
意象模式	发生频率较低、情绪唤醒程度较高；涉及创伤性体验(通常是生理或心理或二者兼而有之)。	常见于规模较小、成员极其忠诚的群体(如从事战争与袭击的小型传统社会、现代军队和反动组织，邪教)，以恐怖仪式为代表，如入会仪式、渡火仪式、割礼等。	通过对含有共同焦虑经历的情境记忆进行自我概念建构和亲属识别，产生心理亲属感，促进身份融合。身份融合的个体容易作出极端利他行为。
教条模式	发生频率较高、情绪唤醒程度较低；强调信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呈现，容易向儿童和陌生人传播。	多见于人数较多的大型社会(如宗教组织、部落、城市和国家)，以频繁、重复的常规化仪式为代表，如教堂、清真寺、会堂内的祈祷，或者小学生每天的宣誓活动。	通过对语义记忆中社会规范的觉察产生联盟心理，联盟心理催生群体认同，群体认同促进陌生成员之间的合作。

大量的时间、精力、资源及其产生的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言，仪式是很难被伪造的(Soler, 2012)。因此，作为信誉增强显示器(the credibility- enhancing display)，仪式体现了个体对群体价值观所作承诺的可靠性，是个体承诺可靠与否的重要行为证据(Watson-Jones & Legare, 2016)。

在进化的过程中，传统小规模群体通常从事防御、狩猎、新娘俘获等具有高风险和强大诱惑缺陷的活动。小规模群体的生存与发展通常需要极端的自我牺牲，摒除“搭便车的风险”，以保全大部分成员的利益。意象模式的功能就是以昂贵的标志作为对群体规范和价值观的承诺。昂贵标志涉及个体难以忍受的极端考验，如辱骂、严重烧伤、身体残害等。作为向群体作承诺的一种方式，意象模式能促进和巩固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团结，激发极端利他行为，从而抵御风险，促进小规模群体的生存和发展(Whitehouse, François, & Turchin, 2015; Whitehouse & Lanman, 2014)。

随着农业的发展，大型且人口密集的人群不再需要用代价昂贵的意象模式来将群体成员联系到一起。相反，他们往往通过常规化的教条模式来强调群体的价值观和意象倾向，克服因群体规模较大而引起的分歧，最终催生群体认同和合作(Whitehouse et al., 2015; Whitehouse & Lanman, 2014)。教条模式通常与频繁的重复相关联，频繁重复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信誉增强显示器(Atran & Henrich, 2010; Henrich, 2009)，换句话说，大规模群体将大量的时间投入(高频率、重复)而不是少见但是极其痛苦或不愉快的经历作为承诺的标识。教条模式通过常规化激活存储于语义记忆中的社会规范，进而将其成员联系在一起。群体信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信誉标志的增强和个体对其想象群体责任感的需要，减少了大规模群体成员背叛的风险，使得完全陌生或者相对陌生的个体足够信任对方，并以治理、贸易、农业集中、结盟等方式合作(Whitehouse & Lanman, 2014)。

3 集体仪式的心理学实证研究

3.1 集体仪式促进凝聚力

集体仪式能提高凝聚力，凝聚力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群体的“寿命” (Legare & Watson-Jones, 2015)。凝聚力的增强可以表现为：社会联结、内群体接纳/归属感、身份融合、群体认同以及群体实体性感知的增强(Lakens, 2010; Lakens & Stel, 2011; Legare & Wen, 2014; Mogan, Fischer, & Bulbulia, 2017)。当前的研究主要从集体仪式对社会联结和内群体接纳/归属感的影响来展开。

3.1.1 集体仪式提高社会联结

人类学家早就提出集体仪式能将个体和群体联结在一起(Hagen & Bryant, 2003)。社会联结(social bonding)是个体对周围世界人际关系亲密度的自我觉察，是个体归属感的重要成分。同时，社会联结高的个体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有更多的亲密感，倾向于认同他人，将他人看成是友好可亲的，还会积极参与到社会团体活动中(Lee & Robbins, 1998)。

集体仪式对社会联结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比如，研究发现，在参与过渡火仪式之后，仪式参与者与群体的融合感更强烈了。集体仪式——特别是那些引人注目的、涉及更多努力或痛苦的、可以在参与者之间产生共同强烈情感体验的集体仪式——的参与，最终会让参与者感到更接近其他群体成员(Páez, Rimé, Basabe, Wlodarczyk, & Zumeta, 2015)。剧烈的仪式(intense rituals)能增加群体凝聚力和合作行为(Atran & Henrich, 2010)，且仪式强烈程度与小规模群体的认同相关(Choi & Bowles, 2007; Ginges, Hansen, & Norenzayan, 2009)。

研究者还发现，除了那些含有痛苦体验的集体仪式外，包括同步动作的集体仪式也是有效的群体联结活动(Tarr, Launay, Cohen, & Dunbar, 2015)。Reddish, Tong, Jong, Lanman和Whitehouse (2016)对比了同步条件与非同步条件下被试的社会联结感，结果发现：同步动作促进了个体与其他群体成员的同一感和社会联结。然而，同步动作和同步声音虽然提高了被试对社会联结的知觉，但是这种积极影响只有小到中等程度(Mogan et al., 2017)。此外，不同努力程度的同步动作对社会联结的影响不同。研究者发现，站立完成的全身同步舞蹈动作和坐着完成的同步手势相比，前者需要付出的努力更多，产生的社会联结水平也更高(Tarr et al., 2015)。社会联结水平还与同步动作的节奏相关，从同步动作的节奏可以推断个体社会联结的水平(Lakens & Stel, 2011)。

集体仪式对社会联结的作用可以用两个机制加以解释。一方面，集体仪式会引起个体和他人的融合，模糊自我和他人的边界，拉进彼此的心

理距离(Tarr, Launay, & Dunbar, 2014)。另一方面，研究者发现，内啡肽(endorphins)能引发积极的情绪，如愉悦和快乐。通过内啡肽的释放，同步动作能增加社会联结(Lang, Bahna, Shaver, Reddish & Xygalatas, 2017; Launay, Tarr, & Dunbar, 2016; Tarr et al., 2014, 2015)。以上两个过程的最终结果都是群体凝聚力的提升。

3.1.2　集体仪式增加内群体接纳和归属感

集体仪式是人们获得内群体归属(intergroup affiliation)的一种手段。集体仪式的参与能让个体在群体中获得地位、避免排斥，最终为群体所接纳(Fischer & Xygalatas, 2014)。除促进个体与群体成员的交往外(Páez et al., 2015)，集体仪式还能提高个体对其他群体成员动作感知的敏感性，增加群体成员在之后共同任务中的成功，进而提高社会凝聚力(Valdesolo, Ouyang, & DeSteno, 2010)。

Wen, Herrmann和Legare (2016)采用新社会群体范式(the novel social paradigm)考察了4~11岁儿童仪式参与经历对其群体归属感的影响。实验中，实验者将儿童分为黄队和绿队，并让他们完成有固定顺序的、同步且由一个领导者示范的项链制作任务(仪式组)或无固定顺序的、由一个领导者监督的项链制作任务(控制组)。结果发现：与仅参加群体活动的儿童相比，那些参加项链制作仪式的孩子报告了更高水平的内群体接纳 (in-group affiliation)，也更为偏爱自己所在群体的成员。与被社会接纳的孩子相比，被排斥的孩子更可能模仿其他内群体成员的仪式行为(Legare & Nielsen, 2015; Watson-Jones, Whitehouse, & Legare, 2016)。例如，那些被放置于新群体中的婴儿总是期望自己与其他群体成员有相同的行为(Powell & Spelke, 2013)，且与外群体成员相比，他们更为频繁地模仿内群体成员(Buttelmann, Zmyj, Daum, & Carpenter, 2013)。有研究者还发现，如果仪式行为是同步进行的而不是基于结果的，那么儿童会更多的模仿这种行为(Herrmann, Legare, Harris, & Whitehouse, 2013)。儿童的这种高保真模仿(high-fidelity imitation)与社会基本问题相关，如规范行为(Kenward, Karlsson, & Persson, 2011)、共同体验(Tomasello, Carpenter, Call, Behne, & Moll, 2005)、归属动机(Over & Carpenter, 2013)的编码。可见，仪式的模仿是人类早期获得群体接纳的一种方式。成人对仪式的模仿更为精细，他们不仅局限于仪式动作的“高度仿真”，还积极学习那些来自于群体权威人物、大多数群体成员的价值观和信念(Henrich, 2009; Henrich & Gil-White, 2001)。此外，成人在选择其所需模仿的仪式行为时更为挑剔，通常将因果关系不透明的动作作为首选(McGuigan, Makinson, & Whiten, 2011)。

研究者还发现集体仪式本身需要的代价与内群体吸引力相关。集体仪式参与所需的努力愈多，带来的生理或心理痛苦愈强烈，内群体就愈有吸引力，亦即集体仪式参与的代价越昂贵，群体就越具有吸引力。Aronson和Mills (1959)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要求自愿加入讨论群的女性被试经历三种不同条件的入会仪式(严苛、中性和控制)，方可成为群体的一员。入会仪式完成后，给被试听一段无聊的群体讨论录音，录音中的群体是不存在的，被试在实验期间没有交流，仅凭录音来对该群体做出选择。结果发现：与中性条件或控制条件下的被试相比，严苛条件下的被试显得更加喜欢自己所在的群体以及群体成员。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有两种：其中一种认为，这是减少认知失调的结果，即不得不忍受尴尬的测试从而成为无聊群体的成员引起了认知失调，为了减少认知失调，被试提高了对群体的评价(Festinger, 196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处于威胁情境下的个体比处于非威胁情境下的个体有更强的归属感需求，由于对群体成员接纳的强烈需求，被试所经历的严苛入会仪式会使群体更具吸引力(Lodewijkx & Syroit, 1997, 2001)，亦即入会仪式越严苛，群体一致性和凝聚力越高(Waldron, Lynn, & Krane, 2011)。

另外一些研究者对上述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入会仪式的残酷程度和群体吸引力之间存在负相关，而不是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受到挫折、孤独和抑郁情绪的中介作用(Lodewijkx, van Zomeren, & Syroit, 2005)。与这一发现相一致，van Raalte, Cornelius, Linder和Brewer (2007)发现：调查对象被迫忍受的欺侮或观察到他人所受的欺侮越多，那么他们在与运动相关的任务中体验到的群体凝聚力越低。还有研究者对入会仪式期间侮辱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发现入会仪式期间经历侮辱会使新成员间的联系变少。尤其当个体是唯一的受害者时，个体会体验到更多的侮辱，与群体的联系也越少，来自其他

成员的社会支持则会对这种状况起到缓和作用(Mann, Feddes, Doosje, & Fischer, 2016)。换句话说，如果被试在入会仪式上没有经历侮辱，那么入会仪式才可能增加群体对他们的接纳。

3.2 集体仪式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与有亲缘关系和没有亲缘关系的人合作是人类生活的主旋律，研究者通常将发生于前者中的合作行为称为极端利他行为，而将发生于后者中的合作称为合作行为(Trivers, 1971)。极端利他行为不仅意味着利他者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这种利他性仅指向有血缘关系的群体成员或内群体成员，因此，极端利他行为又称作狭隘亲社会性。相对而言，合作行为不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合作益处不仅指向有血缘关系的成员或内群体成员，也指向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或外群体成员，所以合作行为也被称为广义亲社会性(Reddish et al., 2014, 2016; Whitehouse & Lanman, 2014)。

3.2.1 意向模式与亲社会行为

大量研究表明仪式行为的投入能带来高水平合作的回报(Ruffle & Sosis 2007; Soler, 2012; Sosis & Bressler, 2003; Xygalatas, Mitkidis et al., 2013)。Xygalatas, Mitkidis等人(2013)的研究显示，在高水平严酷考验的仪式条件下，无论是仪式的观察者还是表演者，他们捐赠的钱都比低水平严酷考验仪式条件下的表演者多，这说明亲社会性与高水平严酷考验的仪式呈正相关关系。此外，痛苦程度与捐赠行为相关，被试知觉到的痛苦水平越高，其捐赠的钱也就越多。经历低水平严酷考验仪式的参与者表露的是狭隘的认同，他们更喜欢将自己看成是印度教教徒；相反，那些高水平严酷考验仪式条件下的表演者和观察者则更喜欢更具包容性的毛里求斯身份。这一结论似乎与Whitehouse和Lanman提出的极端仪式产生身份融合的观点相悖。Swann等人(2012)对此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极端仪式条件下出现的牺牲自我促进大规模匿名群体利益的意愿，如国家和世界宗教，已经不仅仅是身份融合，而应将之称为“延伸融合” (extended fusion)。

3.2.2 同步动作促进亲社会行为

首先，包含了大量同步动作的集体仪式能够促进狭隘亲社会性。Wiltermuth 和 Heath (2009)对三个不同的同步动作——一起行走、一起唱歌或者一起摇杯子——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那些与他人进行同步运动的个体更愿意在之后的公共利益游戏中与内群体成员合作，即使是在需要个人牺牲的情况下。Ruffle 和 Sosis (2006)用一次性博弈(One-shot game)对以色列集体农场成员的合作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面对群体利益时，被试选择了与内群体成员合作的策略。在此基础之上，研究者发现：与很少去犹太教堂的男性相比，那些经常去教堂参加共同祈祷仪式的男性觉知到的集体农场的合作和团结水平更高，也更愿意在经济活动中合作——前提是合作的对象同是集体农场成员(Ruffle & Sosis, 2007; Sosis & Bressler, 2003; Sosis & Ruffle, 2003)。另外一些研究者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他们发现，与他人同步和协调一致的运动，如一起跳舞和一起工作，能促进被试利他情感的产生(Reddish, Fischer, & Bulbulia, 2013); 同时，与非同步条件相比，同步条件下的被试更愿意帮助他们的同伴，也更有可能真正花时间帮助他人(Reddish et al., 2013; Valdesolo & DeSteno, 2011)。

对非成人被试同步动作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对最小年龄被试(14个月)的研究发现，其同步性的亲社会效应仅限于同步伙伴，即当婴儿与实验者一起进行过同步动作之后，不太可能帮助陌生人(Cirelli, Wan, & Trainor, 2014)。也有研究者用共同音乐制作任务对4岁儿童的亲社会性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共同音乐制作对儿童的亲社会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与未参加共同音乐制作任务的孩子相比，参加了共同音乐制作任务的儿童更愿意帮助他人并倾向于选择以合作的方式完成任务。此外，就未做出帮助行为的情况而言，共同音乐制作条件下比非音乐条件下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同情或者是社会承诺。可见，共同音乐制作提高了 4 岁儿童的亲社会行为(Kirschner & Tomasello, 2010)。Tarr 等人(2015)对比了完全同步动作和部分同步动作对高中生亲社会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同步动作的亲社会效应仅在共同参与者中发现，在没有参与过同步动作的学生中没有发现内群体亲社会效应。Mogan 等人(2017)指出，同步动作对狭隘亲社会性只有中等程度的积极影响。

第二，同步动作促进广义亲社会行为。Reddish 等人(2014)用最简群体范式(Tajfel, 1974)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在同步动作条件下，被试更愿意将钱给非表演者(外群

体成员)，即同步动作诱发了广义的亲社会行为。在此基础之上，研究者进一步验证了同步动作的亲社会效应。研究选取了150名来自不同学校的大学生，对他们在同步动作条件与非同步动作条件下的亲社会性进行考察。结果发现，与非同步动作条件相比，同步动作条件下的被试更愿意帮助表演群体之外的匿名个体，且同步条件下愿意帮助外群体成员的被试人数是非同步性条件下的3倍多。可见，同步动作的亲社会效应延伸到表演群体之外(Reddish et al., 2016)。与冥想仪式(calming practices)相关的研究发现，集体仪式不仅能增加广义的亲社会性，还能降低狭义亲社会性。实验者发现：在群体背景下，冥想仪式减少了狭隘利他主义，增加了广义利他主义。群体冥想仪式能预测更高水平的合作，对狭隘利他主义的减少效应也更大。如果冥想仪式以及与冥想仪式相似的仪式促进了广泛的利他主义，那么它们也能促进大群体间的合作(Frost, 2016)。

除此之外，Reddish 等人(2013)还发现当同步动作与群体的目标相关时，同步动作能产生高水平的合作，即共同目标与同步动作的结合增强了被试合作的趋势，这一结论揭示了集体价值观是同步动作促进合作的内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集体仪式产生群际偏差

一直以来，与集体仪式功能有关的研究呈现的都是集体仪式的“光明面”，如促进亲社会性、增进社会联结、提高内群体归属感，但近期的研究揭露了仪式的“黑暗面”——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集体仪式损坏了个体与外群体的联系，造成群际偏差(intergroup bias)。这种由集体仪式引起的群体偏差表现为：被试增加了对内群体成员的经济信任，当面对外群体成员的惩罚时却持赞同态度(Hobson, Gino, Norton, & Inzlicht, 2017)，即偏爱内群体，贬抑外群体。研究者认为群际偏差的产生主要归咎于对群体价值观的过分“神圣化”(Jones, 2013)，神圣化的价值观会放大被试对内群体威胁的觉知，从而导致群际冲突的产生(Sheikh, Ginges, Coman, & Atran, 2012)。

研究者要求被试分别完成三种任务。控制条件下，被试在听音乐的同时在桌子上方举一个塑料杯子 90 s，在这一条件下，所有被试要保持一致；同步和非同步条件下，被试需要同时以特定的顺序跟着音乐节拍翻转杯子若干次，其中同步条件下，所有被试听相同的节拍，非同步条件下听不同的节拍。结果发现：与他人进行同步动作的被试更有可能服从其他进行同步动作的同伴的要求，从而对不属于自己群体的人做出攻击性行为或不道德行为(Wiltermuth, 2012)。Hobson等人(2017)在此基础上，用最简群体范式对新仪式(novel ritual)的功能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如新仪式足够精细以及多次重复)，新仪式能产生群际偏差，当剔除文化和历史背景时，新仪式会在新形成的群体中产生群际偏见而不是群体合作(Launay, Dean, & Bailes, 2013)。Wood, Caldwell-Harris和Stopa (2017)用双重条件范式(two-condition paradigm)验证了同步性对三人复杂口头协调任务的影响，发现同步条件下的群体任务表现最差，参加了同步动作的被试报告了与更高水平任务相关的人际冲突、更低水平的群体实体性以及人际关系相似性觉知。可见，集体仪式虽然能增加内群体凝聚力和信任，但是通常以牺牲外群体为代价(Hobson et al., 2017)。同步动作增加了遵从群体要求的重要性，因此，它不仅能鼓励人们去做对群体有益的行为，还能迫使人们对外群体成员做出攻击行为或不道德行为。由此可见，同步动作对群体行为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Wiltermuth, 2012)。

4　问题与展望

宗教模式理论通过对集体仪式、凝聚力以及亲社会行为三者之间关系的阐述，深刻揭示了集体仪式对群体建设和发展的影响。该理论对集体仪式、凝聚力的界定，以及仪式产生凝聚力的心理过程的解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然而，目前研究者们对凝聚力的操作性定义主要集中于社会联结、内群体接纳、归属感这些范畴，很少对群体认同、身份融合这两种形式的凝聚力展开深入考察。

集体仪式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纽带，也是传承中国文化与精神的重要桥梁。仪式在古代中国通常被称为“礼仪”，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祖先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大小小的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 (黄仁宇, 2007, p3−7)。现代中国举行的许多大型仪式是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礼仪

的传承和创新，比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举行的仪式[2]形式，是国家领导与民众、现场与网上多平台的同步祭奠仪式。2008 年中国奥运会的开幕、闭幕式，以其宏大叙事和大规模群体表演——同步动作，展现了中国人集体主义文化的魅力和高效性。又如以传承传统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的地方“祭孔”仪式，以联络血脉至亲、继承先祖精神的民间性质的祭祖礼(王霄冰, 2011)。根据宗教模式理论对仪式的分类，这些以一定规模群体来实践的仪式为“教条模式”。通过参与教条模式，参与者将社会规范存储于语义记忆中，并由于觉察到与他人共同的身份标识、信仰、习俗以及价值观而产生联盟心理，促进群体认同、增强亲社会行为(Whitehouse & Lanman, 2014)。但是，教条模式产生语义记忆这一观点目前还需要实验证据，而教条模式如何使参与者产生群体认同、增进亲社会行为，即教条模式促进凝聚力的心理机制也还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另外，Wiltermuth 和 Heath (2009)的研究发现群体实体性对同步动作的亲社会效应有部分中介作用，即同步运动可以通过增加群体实体性来加强合作。Reddish 等人(2016)的研究却发现社会联结、延伸身份融合以及延伸群体认同对同步动作影响亲社会性的间接作用不显著。由此可见，集体仪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亟需更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另外，“宗教模式理论”认为，意象模式对身份融合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情境记忆来完成的，但Schjoedt等人(2013)对意象模式能产生情境记忆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集体仪式不会产生情境记忆，并用仪式的认知资源模型(resource model of ritual cognition)对其观点进行了解释。仪式的认知资源模型认为：集体仪式限制了个体用以加工宗教事件的认知资源可用性，其目的是增加仪式参与者对集体观念的感受性。例如那些在入会仪式中接受了痛苦刺激的被试通常被期望显得平静或勇敢，并且在经受考验时能抑制他们的焦虑和恐惧，抑制恐惧和痛苦情绪表达的社会愿望可能将记忆形成的注意资源转移到情绪调节上(Schjoedt et al., 2013)。对大多数有着高水平情绪唤醒的仪式来说，情绪唤醒伴随着高水平的情绪调节。集体仪式包含的一系列特征(如模式化、重复、冗余等)会调节用于监督和更新情境的认知资源的投入量。这些效应会损坏个体建构情境记忆和有意义的叙事的意图。研究表明，渡火者在仪式后未能及时编码或提取任何详细的情境记忆(Xygalatas, Schjoedt et al., 2013)。也就是说，集体仪式不会产生情境记忆，因为用于构建情境记忆的认知资源被情绪表达抑制这一心理过程占用了。“宗教模式理论”提出，集体仪式不仅包含了焦虑情绪的唤醒，也包括了愉悦情绪的唤醒。在中国，较为常见的是包含了愉悦情绪的集体仪式，如赛龙舟、少数民族的同步集体舞蹈等。当前集体仪式的研究大多涉及焦虑情绪，对包含愉悦情绪的集体仪式的研究较少。未来可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虽然 Whitehouse 和 Lanman 指出因果关系不透明才是集体仪式的核心要素，而一些心理学家也倾向于将仪式看成是社会规定的、因果关系不透明的行为(Legare & Souza, 2014; Legare, Wen, Herrmann, & Whitehouse, 2015)，但是当前的研究多集中关注同步动作对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对因果关系不透明的研究仅在仪式效能评估方面有少量涉及(Kapitány & Nielsen, 2015; Legare & Souza, 2012)。因此，从因果关系不透明切入，研究集体仪式可能会成为未来这一领域的焦点。

[2] 国家公祭网, http://www.cngongji.cn/newcenter/index.htm。

参考文献

黄仁宇. (2007). *万历十五年*. 北京：中华书局.

王霄冰. (2011). 仪式的建构与表演——2011 清明节曲阜祭孔与祭祖活动的人类学考察. *文化遗产*, (3), 108–115.

Aronson, E., & Mills, J. (1959). The effect of severity of initiation on liking for a group.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 Social Psychology, 59*, 177–181.

Atkinson, Q. D., & Whitehouse, H. (2011). The cultural morphospace of ritual form: Examining modes of religiosity cross-culturally.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32*, 50–62.

Atran, S., & Henrich, J. (2010). The evolution of religion: How cognitive by-products, adaptive learning heuristics, ritual displays, and group competition generate deep commitments to prosocial religions. *Biological Theory, 5*, 18–30.

Bell, C. (1997). *Ritual: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och, M. (1992). *Prey into hunter: The politic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ttelmann, D., Zmyj, N., Daum, M., & Carpenter, M. (2013). Selective imitation of in-group over out-group members in 14-month-old infants. *Child Development, 84*, 422–428.

Choi, J. K., & Bowles, S. (2007). The coevolution of parochial altruism and war. *Science, 318*, 636–640.

Cirelli, L. K., Wan, S. J., & Trainor, L. J. (2014). Fourteen-month-old infants use interpersonal synchrony as a cue to direct helpfulnes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9*, 20130400.

Clayton, M., Sager, R., & Will, U. (2005, January). In time with the music: The concept of entrain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ethnomusicology. In *European meetings in ethnomusicology* (Vol. 11, pp. 1–82). Romanian 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

Fessler, D. M. T., & Holbrook, C. (2016). Synchronized behavior increases assessments of the formidability and cohesion of coalitions.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37*, 502–509.

Festinger, L. (1962).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Vol. 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R., & Xygalatas, D. (2014). Extreme rituals as social technologies. *Journal of Cognition & Culture, 14*, 345–355.

Fredman, L. A., Buhrmester, M. D., Gomez, A., Fraser, W. T., Talaifar, S., Brannon, S. M., & Swann, W. B., Jr. (2015). Identity fusion, extreme pro-group behavior, and the path to defusion. *Social &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9*, 468–480.

Frost, K. (2016). *Cultural and gene-cultural effects and 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prosocial ritual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Ginges, J., Hansen, I., & Norenzayan, A. (2009). Religion and support for suicide attack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 224–230.

Hagen, E. H., & Bryant, G. A. (2003). Music and dance as a coalition signaling system. *Human Nature, 14*, 21–51.

Henrich, J. (2009). The evolution of costly displays, cooperation and religion: Credibility enhancing display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ultural evolution.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30*, 244–260.

Henrich, J., & Gil-White, F. J. (2001). The evolution of prestige: Freely conferred deference as a mechanism for enhancing the benefit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22*, 165–196.

Herrmann, P. A., Legare, C. H., Harris, P. L., & Whitehouse, H. (2013). Stick to the script: The effect of witnessing multiple actors on children's imitation. *Cognition, 129*, 536–543.

Hobson, N. M., Gino, F., Norton, M. I., & Inzlicht, M. (2017). When novel rituals lead to intergroup bias: Evidence from economic games and neurophysi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 733–750.

Jones, D. (2013). The ritual animal. *Nature, 493*, 470–472.

Kapitány, R., & Nielsen, M. (2015). Adopting the ritual stance: The role of opacity and context in ritual and everyday actions. *Cognition, 145*, 13–29.

Kenward, B., Karlsson, M., & Persson, J. (2011). Over-imitation is better explained by norm learning than by distorted causal learning.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8*, 1239–1246.

Kirschner, S., & Tomasello, M. (2010). Joint music making promotes prosocial behavior in 4-year-old children.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31*, 354–364.

Lakens, D. (2010). Movement synchrony and perceived entitativ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701–708.

Lakens, D., & Stel, M. (2011). If they move in sync, they must feel in sync: Movement synchrony leads to attributions of rapport and entitativity. *Social Cognition, 29*, 1–14.

Lang, M., Bahna, V., Shaver, J. H., Reddish, P., & Xygalatas, D. (2017). Sync to link: Endorphin-mediated synchrony effects on cooperation. *Biological Psychology, 127*, 191–197.

Launay, J., Dean, R. T., & Bailes, F. (2013). Synchronization can influence trust following virtual interaction.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0*, 53–63.

Launay, J., Tarr, B., & Dunbar, R. I. M. (2016). Synchrony as an adaptive mechanism for large-scale human social bonding. *Ethology, 122*, 779–789.

Lee, R. M., & Robbins, S. B. (199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onnectedness and anxiety, self-esteem, and social identit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5*, 338–345.

Legare, C. H., & Herrmann, P. A. (2013). Cognitive consequences and constraints on reasoning about ritual. *Religion, Brain & Behavior, 3*, 63–65.

Legare, C. H., & Nielsen, M. (2015).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dual engines of cultural learn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9*, 688–699.

Legare, C. H., & Souza, A. L. (2012). Evaluating ritual efficacy: Evidence from the supernatural. *Cognition, 124*, 1–15.

Legare, C. H., & Souza, A. L. (2014). Searching for control: Priming randomness increases the evaluation of ritual efficacy. *Cognitive Science, 38*, 152–161.

Legare, C. H., & Watson-Jones, R. E. (2015). The evolution and ontogeny of ritual. In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Vol. 2: Integrations* (2nd ed., pp. 829–847). Hoboken, NJ: Wiley.

Legare, C. H., & Wen, N. J. (2014). The effects of ritual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group cogniti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 9–12.

Legare, C. H., Wen, N. J., Herrmann, P. A., & Whitehouse, H. (2015). Imitative flexi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learning. *Cognition, 142*, 351–361.

Lodewijkx, H. F. M., & Syroit, J. E. M. M. (1997). Severity of initiation revisited: Does severity of initiation increase attractiveness in real group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7*, 275–300.

Lodewijkx, H. F. M., & Syroit, J. E. M. M. (2001). Affiliation during naturalistic severe and mild initiations: Some further evidence against the severity-attraction hypothesis. *Current Research in Social Psychology, 6*, 90–107.

Lodewijkx, H. F. M., van Zomeren, M., & Syroit, J. E. M. M. (2005). The anticipation of a severe initiati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effects on affiliation tendency and group attraction. *Small Group Research, 36*, 237–262.

Mann, L., Feddes, A. R., Doosje, B., & Fischer, A. H. (2016). Withdraw or affiliate? The role of humiliation during initiation rituals. *Cognition and Emotion, 30*, 80–100.

McGuigan, N., Makinson, J., & Whiten, A. (2011). From over-imitation to super-copying: Adults imitate causally irrelevant aspects of tool use with higher fidelity than young childre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2*, 1–18.

Mcquinn, B. (2012). After the fall: Libya’s evolving armed groups. *Fortune, 144*, 34–35.

Mogan, R., Fischer, R., & Bulbulia, J. A. (2017). To be in synchrony or not? A meta-analysis of synchrony's effects on behavior, perception, cognition and affec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2*, 13–20.

Neale, L., Mizerski, R., & Lee, A. (2008, January). Measuring consumer rituals: A marketing applic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winter educators’ conference: Marketing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products and services.* Austin, Texas.

Over, H., & Carpenter, M. (2013). The social side of imitation.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7*, 6–11.

Páez, D., Rimé, B., Basabe, N., Wlodarczyk, A., & Zumeta, L. (2015).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perceived emotional synchrony in collective gather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 711–729.

Payne, R. J. H. (1998). Gradually escalating fights and displays: The cumulative assessment model. *Animal Behaviour, 56*, 651–662.

Powell, L. J., & Spelke, E. S. (2013). Preverbal infants expect members of social groups to act alik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0*, E3965–E3972.

Rappaport, R. A. (1999). *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ddish, P., Bulbulia, J., & Fischer, R. (2014). Does synchrony promote generalized prosociality? *Religion, Brain & Behavior, 4*, 3–19.

Reddish, P., Fischer, R., & Bulbulia, J. (2013). Let’s dance together: Synchrony, shared intentionality and cooperation. *PLoS One, 8*, e71182.

Reddish, P., Tong, E. M. W., Jong, J., Lanman, J. A., & Whitehouse, H. (2016). Collective synchrony increases prosociality towards non-performers and outgroup member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5*, 722–738.

Rossano, M. J. (2012). The essential role of ritual in the transmiss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social norm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8*, 529–549.

Ruffle, B. J., & Sosis, R. (2006). Cooperation and the in-group-out-group bias: A field test on Israeli kibbutz members and city resid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60*, 147–163.

Ruffle, B. J., & Sosis, R. (2007). Does it pay to pray? Costly ritual and cooperation.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7*, 259–277.

Schjoedt, U., Sørensen, J., Nielbo, K. L., Xygalatas, D., Mitkidis, P., & Bulbulia, J. (2013). Cognitive resource depletion in religious interactions. *Religion, Brain & Behavior, 3*, 39–55.

Shaver, J. H., & Sosis, R. (2014). How does male ritual behavior vary across the lifespan? An examination of Fijian kava ceremonies. *Human Nature, 25*, 136–160.

Sheikh, H., Ginges, J., Coman, A., & Atran, S. (2012). Religion, group threat and sacred values. *Judgment & Decision Making, 7*, 110–118.

Soler, M. (2012). Costly signaling, ritual and cooperation: Evidence from Candomblé, an Afro-Brazilian religion.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33*, 346–356.

Sosis, R., & Bressler, E. R. (2003). Cooperation and commune longevity: A test of the costly signaling theory of religio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37*, 211–239.

Sosis, R., & Ruffle, B. J. (2003). Religious ritual and cooperation: Testing for a relationship on Israeli religious and secular kibbutzim. *Current Anthropology, 44*, 713–722.

Swann, W. B., Jr., Gómez, Á., Dovidio, J. F., Hart, S., & Jetten, J. (2010). Dying and killing for one’s group: Identity fusion moderates responses to intergroup versions of the trolley problem.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1176–1183.

Swann, W. B., Jr., Gómez, Á., Huici, C., Morales, J. F., & Hixon, J. G. (2010). Identity fusion and self-sacrifice: Arousal as a catalyst of pro-group fighting, dying, and help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 824–841.

Swann, W. B., Jr., Gómez, Á., Seyle, D. C., Morales, J. F., & Huici, C. (2009). Identity fusion: The interplay of personal

and social identities in extreme group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6*, 995–1011.

Swann, W. B., Jr., Jetten, J., Gómez, Á., Whitehouse, H., & Bastian, B. (2012). When group membership gets personal: A theory of identity fus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 441–456.

Tajfel, H. (1974).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behaviour.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3*, 65–93.

Tambiah, S. J. (1979). A performative approach to ritual.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65*, 113–169.

Tarr, B., Launay, J., & Dunbar, R. I. M. (2014). Music and social bonding: "Self-other" merging and neurohormonal mechanism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1096.

Tarr, B., Launay, J., Cohen, E., & Dunbar, R. (2015). Synchrony and exertion during dance independently raise pain threshold and encourage social bonding. *Biology Letters, 11*, 1–4.

Tomasello, M., Carpenter, M., Call, J., Behne, T., & Moll, H. (2005). In search of the uniquely human. *Behavioral & Brain sciences, 28*, 721–727.

Trivers, R. L. (1971).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46, 35–57.

Turner, J. C. (1985).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the self-concept: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roup behavior.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2*, 77–122.

Uche, C. O., & Atkins, J. F. (2015). Accounting for rituals and ritualization: The case of shareholders' associations. *Accounting Forum, 39*, 34–50.

Valdesolo, P., & Desteno, D. (2011). Synchrony and the social tuning of compassion. *Emotion, 11*, 262–266.

Valdesolo, P., Ouyang, J., & DeSteno, D. (2010). The rhythm of joint action: Synchrony promotes cooperative abi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693–695.

van Raalte, J. L., Cornelius, A. E., Linder, D. E., & Brewer, B. W. (200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zing and team cohesion. *Journal of Sport Behavior, 30*, 491–507.

Waldron, J. J., Lynn, Q., & Krane, V. (2011). Duct tape, icy hot & paddles: Narratives of initiation onto US male sport teams. *Sport, Education & Society, 16*, 111–125.

Watson-Jones, R. E., & Legare, C. H. (2016).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group ritual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 42–46.

Watson-Jones, R. E., Legare, C. H., Whitehouse, H., & Clegg, J. M. (2014). Task-specific effects of ostracism on imitative fidelity in early childhood.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35*, 204–210.

Watson-Jones, R. E., Whitehouse, H., & Legare, C. H. (2016). In-group ostracism increases high-fidelity imit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 34–42.

Wen, N. J., Herrmann, P. A., & Legare, C. H. (2016). Ritual increases children's affiliation with in-group members.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 37*, 54–60.

Whitehouse, H. (2002). Modes of religiosity: Towards a cognitive explanation of the sociopolitical dynamics of religion. *Method & Theory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14*, 293–315.

Whitehouse, H. (2004). *Modes of religiosity: A cognitive theory of religious transmission*.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Whitehouse, H., & Mcquinn, B. (2013). Ritual and violence: Divergent modes of religiosity and armed struggle. In *Oxford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viol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itehouse, H., & Lanman, J. A. (2014). The ties that bind us. *Current Anthropology, 55*, 674–695.

Whitehouse, H., François, P., & Turchin, P. (2015). The role of ritual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omplexity: Five predictions and a drum roll. *Molecular Biosystems, 6*, 802–810.

Wiltermuth, S. S. (2012). Synchronous activity boosts compliance with requests to aggres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453–456.

Wiltermuth, S. S., & Heath, C. (2009). Synchrony and cooper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 1–5.

Wood, C., Caldwell-Harris, C., & Stopa, A. (2017). *The rhythms of discontent: Synchrony impedes performance and group functioning in an interdependent coordination task*. Unpublished manuscript.

Xygalatas, D., Mitkidis, P., Fischer, R., Reddish, P., Skewes, J., Geertz, A. W., … Bulbulia, J. (2013). Extreme rituals promote prosocialit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1602–1605.

Xygalatas, D., Schjoedt, U., Bulbulia, J., Konvalinka, I., Jegindø, E. M., Reddish, P., … Roepstoff, A. (2013).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 a fire-walking ritual.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13*, 1–16..

Collective rituals promote cohesion: Based on action, emotion, and memory

ZOU Xiaoyan; YIN Keli; LU Lin

(*School of Education & Manage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Collective ritual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group. In recent years, foreign psycho-anthropologists have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modes of religiosity," which elaborates profoundly on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collective ritual to produce group cohes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to collective rituals focuses mainly on promotion of cohesion, the influence of synchronic movement on prosocial behavior, and the intergroup conflict caused by collective rituals. Some future study topics should be systematic testing and evaluation, such a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collective ritual influences cohesion, and the collective ritual that arouses pleasure emotion.

Key words: collective ritual; cohesion; prosocial behavior; synchronic movement